

報告

中国书院研究综述（1923—2007）

邓 洪 波*

1 八十五年来书院研究概述

书院源出于唐代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是中国古代士人享受新的印刷技术，在儒、佛、道融合的文化背景之下，围绕著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修书、著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由唐而历五代、宋、元、明、清，经过1200余年的发展，书院得以遍布除今西藏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区，数量至少有7000所以上，成为读书人文化教育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学风士气、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明代开始，它又走出国门，传到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亚、东南亚各国，甚至意大利那不勒斯、美国旧金山等欧美地区，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当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近代以来，因为新学、西学的加盟，它又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而1901年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令，将全国书院改制为大、中、小三级学堂，更使它由古代迈向近现代，得以贯通中国文化教育的血脉。

书院改制甫20年，有识之士如学术大师蔡元培、胡适及青年毛泽东等，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就现代学校的短处，反观传统书院的长处，进而发起了20世纪的第一次书院研究与书院实践运动。由此开始，书院研究走过了八十余年历程。据不完全统计，自1923年青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胡适《书院的历史与精神》发表，到2007年年底，中国（包括大陆港台）学者发表有关书院的论文、资料2302篇¹⁾，出版专著、论文集、资料集162部²⁾，可谓成绩显著。兹将论文分年（代）统计如下，于此可见书院研究本身之发展轨迹，亦可感知其日益受到学术界重视的情形。

*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1) 详见邓洪波、段欣《中国书院研究论文索引（1923—2007）》。

2) 详见邓洪波《中国书院研究著作书目（1929—2006）》。

1923~2007年书院研究论文分年(代)统计表

时代	1920年代	1930年代	1940年代	1950年代	1960年代	1970年代					未详	小计
论文数	7	42	27	19	12	22					17	146
时代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小计
论文数	9	8	22	21	39	60	90	64	94	49		456
时代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小计
论文数	21	31	19	41	32	46	53	79	80	48	10	460
时代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小计		合计
论文数	85	90	108	149	144	208	257	199		1240		2302

对于书院研究的动向,学术界给予了应有的重视。笔者就长期注意观察,除了辑录报刊有关研究论文索引³⁾之外,曾于1986年发表《解放前中国书院史研究述评》⁴⁾。其后,又有《三十六年来书院史研究综述》⁵⁾、《中国书院研究十年(1979~1988)》⁶⁾,分期讨论1949年以后大陆学者探讨书院问题的关切所在。2003~2004年因为兼任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应邀和学生一起完成《中国书院研究综述(1923~2003)》,收入《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之《东亚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⁷⁾。2006年参加韩国国民大学校韩国学研究所韩中日书院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八十三年来的中国书院研究》⁸⁾。李弘祺曾以《中国书院史研究——研究成果现状与展望》⁹⁾为题,注重机构、人物、观点,向日本学术界介绍中国书院的研究成果,对中日学术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蒋建国《20世纪中国书院学研究》¹⁰⁾,基于机构与队伍扩大形成研究群体,出版大量论著,构建学术体系;创办刊物,形成研究园地;引发海外学者研究等事实,认为20世纪已初步形成具有独特研究对象和学科特色的书院学。王炳照《书院研究的回顾与展望》¹¹⁾,视角独特,改变以书院改制后之书院研究为起点的定势,将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及各类学者对书院之评说,皆看作是书院研究,并以1912年、1949年为断点,将中国书院研究史分作三个时期,认为古代反映了革新教育的呼声,近代旨在推动教育近代化,现代则致力于教育的改革与开放,有其教育史家的一贯关

3) 1923~1986年见《岳麓书院通讯》1986年1期;1923~1990年见《中国书院辞典》第977~1013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1991~1997年见《中国书院》第二辑,第394~407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1999~2001年见《中国书院》第四辑,第389~396页。2002~2003年见《中国书院》第六辑,第414~434页。2004~2005年见《中国书院》第七辑,第413~432页,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

4) 《岳麓书院通讯》1986年1期。

5) 《宜春师专学报》1987年6期。

6) 《江西教育科研》1990年1期。

7) 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又见《中国书院》第六辑,改名《八十年中国书院研究综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

8) 《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3期。又见韩国·国民大学校《韩国学论丛》29辑,2007年2月。

9) 日本《中国——社会与文化》1990年第5号。译文见《白鹿洞书院通讯》1991年1期。

10) 《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4期。

11) 《中国书院》第一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切。杜成宪等人《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¹²⁾一书，也有不少篇幅介绍各个时期的书院研究成果。朱汉民《湖南的书院学研究》¹³⁾，意在总结湘省书院研究的阶段性经验。吴超、张之佐《2003年书院研究综述》¹⁴⁾，首次提出了书院研究的年度报告。

本文仍以书院改制后之书院研究为起点，始于1923年，止于2007年底，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讨论。将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关注时代特色与热点问题、研究动向，介绍主要成果，以期促进书院研究的全面发展。

2 初起而兴：1923～1949年

85年的中国书院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1923年，至1949年，共27年。严格地说，把书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进行研究，应从1923年4月青年毛泽东在《新时代》发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算起。他认为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而不应该不加分析的“争毁书院，争誉学校”。书院应毁者是其“八股等干禄之具”的僵死的内容，并不意味着其办学形式都应否定。学校之誉则为“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但亦不意味着它就没有瑕处。毛泽东具体总结了书院和学校办学的优劣，指出被废弃的书院不是全无处，在办学形式上有“师生的感情甚笃”；“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等三条好处；学校取代书院也并非都可赞誉，在办学形式上则有“师生间没有感情”；“用一处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钟点过多，课程过繁”，学生“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等三点不足。这使得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灵性，庸懦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因而主张“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创办吸取二者所长的教育模式，亦即“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自修大学，提出了教育改革的问题。这无疑为书院史研究提出了正确方向，受到了著名学者蔡元培等人的重视和褒奖。

赓即不久，即1923年12月及次年2月，著名学者胡适连续发表《书院的历史与精神》¹⁵⁾、《书院制史略》¹⁶⁾两篇文章（演讲），认为“在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他将书院与当时教育界所倡导的“道尔顿制”（导师制）对比研究，认为两者之“精神大概相同”。因此，为了改革教育就“不得不讲这个书院制度的略史了”，号召研究已经废弃了的书院制度。自此，书院史的研究渐渐

12) 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

13) 《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3期。

14) 《船山学刊》2006年1期。

15) 《教育与人生》，1923年第9期。

16) 《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3期。

受到人们注意，报刊上不断有研究文章发表。到抗日战争前后，在民族危亡之际，研究者认为“书院之创立，是学者对于国家社会有一种抱负，藉着书院来讲明义理，共同去努力国家社会的事业”。为了“复兴民族”和建设民族文化，人们不断地谈到书院，研究书院制度，甚至建立学海、复性、民族等新的书院，书院史研究形成了一个高潮期。四十年代后期，社会处于极度的动乱之中，民不聊生，书院研究的课题同其他一切学术工作一样都暂时中断了。

第一个阶段的最大特点是从反省自西方引入的学校教育入手，总结并肯定书院的经验，作为建设现代教育制度的借鉴。虽然免不了怀旧的情绪，但终属理性而严肃的思考，在书院教育制度、书院与学术学风建设、书院与政治文化等方面形成了不少精彩的观点。其中关于书院精神的论述，就值得纪述。书院之区别于官学，是因为它具有不同的新的精神风貌。胡适最先指出书院的三种精神，即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他认为书院之祭祀是民意之所寄托，代表时代的精神；书院代行古代民意机关的职责；它之研究是自由和自动的。陈东原提出：“自动讲学，不受政府干涉”与“反科举的精神是书院不朽的灵魂，如果失去了这两种精神，而仅保有书院的制度，那也不配算作书院的”¹⁷⁾。在军阀专制主义强压政治的年代，学者们强调书院“自动”、“自由”的民主精神，并将其定作书院的标志，是顺乎自然的事。到1937年，傅顺时在《两宋书院制度》¹⁸⁾一文中，将书院精神概括为六点：时代思潮，怀疑态度，科学方法，人格精神，自动学习，反对科举。后来的研究者们都特别强调书院反科举的精神，但在科举成为读书人唯一的进身之阶的时代，书院是否能够真正与科举处于一种对立状态，还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还有的学者指出，书院的精神就是“讲学自由与经济独立”，且这两项正是“今日学者所渴慕者”。¹⁹⁾

学术名家参与讨论，是这一阶段的另一个特点。胡适之外，柳诒征有《江苏书院志初稿》²⁰⁾、陈东原有《庐山白鹿洞书院沿革考》²¹⁾、《书院史略》²²⁾、《清代书院学风之变迁》²³⁾，钱穆有《五代之书院》²⁴⁾，邓之诚有《清季书院述略》²⁵⁾，张君勱有《书院制度之精神与学海书院之建立》²⁶⁾，杨家骆有《书院制之缘起及其优点》²⁷⁾。

第一阶段标志性的成果有三。一是曹松叶的《宋元明清书院概况》²⁸⁾，取材于地方志，采用计

17) 《书院史略》，见《学风》1931年1卷9期。

18) 《之江期刊》，新1卷7期。

19) 盛朗西《宋元书院讲学制》，见《民铎杂志》1925年6卷1期。

20) 《江苏国学图书馆年刊》4期，1931年8月。

21) 《民铎杂志》，1926年7卷12期。

22) 《学风》，1931年1卷9期。

23) 《学风》，1933年3卷5期。

24) 《贵善半月刊》，1941年2卷17期。

25) 《现代知识》，1947年2卷2、3期。

26) 《新民月刊》，1935年12月1卷7、8期。

27) 《东方杂志》，1940年3月37卷15期。

28)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0集111～114期，1929年12月～1930年1月。

量统计之法，分析历代书院概况，其统计数据与结论，至今还有学者引用。二是盛朗西的《中国书院制度》，是通史性的总结之作，1934年中华书局初版。全书分书院起源，宋、元、明、清各代书院及书院废替等六章，叙述中国书院自唐代至清末的千年发展历史，尤详于书院制度的源流、演变，凡职事设置、山长遴选、学生甄别、学术风尚、讲学内容、藏书、祭祀、讲会、会讲、考课、膏奖等均有涉及。作者叙述与议论不到全书十分之一的篇幅，大量取材于正史、文集，兼采笔记，稍征地方志，排列于叙述论文之后，可谓无一言无出处，其法有类清儒汉学，亦似实证史学。1979年台湾华世出版社再版，杨家骆则将其收入《古今图书集成续编》。三是刘伯骥的《广东书院制度沿革》，是区域性研究的开山之作，1939年商务印书馆（长沙）初版。1958年台湾“国立编译馆”收入《中华丛书》时，改名《广东书院制度》。全书分绪论、起源与变迁、分布的形态、院舍、行政及组织、经费、师生、课程与训导、书院制度在社会的地位、书院制度之没替、结论等十一章，述评广东书院的发展历史及其各种制度。是书实为作者1938年向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申请学士学位的论文，吴康在其序中称此书“虽以粤省为立论中心，而旁征博引、沿流溯源，两宋以来庠序教育咸萃于是。方今海夷（指日本）入寇，中原板荡，宗国文物，日以陵夷。刘君此编，详述故制，寻两宋以来文教本原，示庠序沿革之要，励民族复兴之心，作新邦建设之助，倘亦为谈抗战教育所不可废者与？”

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战争前后，在如何战胜日本军国主义，摆脱民族危机，复兴民族文化的思考中，以新儒家学者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勱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家创建了勉仁、复性、学海、民族、天目等一批新型书院。将抗日救国和弘扬民族精神连结在一起，将研究儒家学术为主体的国学与培养爱国情怀紧密结合，是这批新式书院的共同主题。如学海书院之创立，“是学者对于国家社会有一种抱负，藉着书院来讲明义理，共同去努力国家社会的事业”，为振兴民族文化，在战前创办起来的，它的宗旨是“振起民族文化，参以西学方法及其观点，以期于融会贯通之中重建新中国文化之基础”，“从民族复兴之需要上研究国故”。²⁹⁾1949年，钱穆、唐君毅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创建新亚书院，将宋明书院传统和新的亚洲建设联系到一起，将人格教育、知识教育、文化教育融为一体，是现代社会实践儒家教育理念的典范。如何正确评价这些书院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也是我们研究书院历史的任务之一。

3 坠而不绝：1950～1979年

第二个阶段自1950年，至1979年，共30年。这个阶段，大陆、香港、台湾学者不相往来，学术隔绝。五十年代，大陆基本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书院史研究受到不应有的冷落，到1966年，除各地《文史资料》刊登17篇书院资料之外，只发表了三篇论文。文革十年，则完全是一段空白。至1979年，《华南师院学报》第一期发表杨荣春《中国古代书院的学风》，这是重新研究书院

29) 张君勱《书院制度之精神与学海书院之设立》，1935年《新民月刊》1卷7、8期。

的初始工作。这一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是周力成的《漫话东林书院》³⁰⁾。

这个阶段，当大陆的研究停滞不前时，台湾、香港学者则于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分别发表16、11、15篇文章，并重印盛朗西、刘伯骥两书³¹⁾。所有这些努力，保有书院研究这一学术园地不致荒芜。最重要的成果是孙彦民的专著《宋代书院制度之研究》³²⁾，曾被港台及海内学者广泛引用。陈道生《中国书院教育新论》³³⁾、《书院建设之源流》³⁴⁾，张胜彦《清代台湾书院制度初探（上、下）》³⁵⁾，王镇华《台湾的书院建筑（上、中、下）》³⁶⁾，何佑森《元代书院之地理分布》³⁷⁾，严耕望《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兼论书院制度起源》³⁸⁾，丁肇怡《书院制度及其精神》³⁹⁾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说明台港研究不仅仍沿了三四十年代大陆的传统，而且开拓了不少新的领域，而教育史学家王凤喈指导韩国留学生金相根完成硕士学位论文《韩国书院制度之研究》⁴⁰⁾，更将书院研究领域拓展至海外。这些皆成为八九十年代书院研究大发展的基础。

4 勃然兴盛：1980～1999年

统计数据表明，20世纪最后二十年，是中国书院研究的兴盛期。需要说明的是八十、九十年代各自有一个从初期向中后期攀升的轨迹，在1986～1988年、1996～1998年形成两个高峰期，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由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创立1010周年、1020周年庆典，举行学术研讨会造成的集约效应，初期的低落可以看作是中后期冲刺的准备，这是中国庆典式学术活动在书院研究领域的反映。

1981年，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⁴¹⁾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宋元明清书院的演变及其内容》⁴²⁾、张正藩《中国书院制度考》⁴³⁾三本著作在上海、北京、台北分别出版，这预示着中国书院研究第二个高潮的到来。1985年一年，全国发表书院论文60篇，首次超过二十年代以来任何一个十年的总和。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数据，从此，中国书院研究进入一个持

30)《群众》，1979年6期。

31) 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华世出版社，1979年。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重印时改名《广东书院制度》，国立编译馆，1958年初版，1978年再版，收入中华丛书。

32) 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教育研究所，1963年。

33) 台北，《师大教育研究所集刊》，1958年6月1期。

34) 台北，《思与言》，1962年12月2卷3期。

35) 台北，《食货月刊》，1976年3、4期。

36) 台湾，《建筑师》，1978年6、7、8期。

37) 香港，《新亚学报》，1956年1期。

38) 香港，《民主评论》，1954年12月号。

39) 香港，《民主评论》，1959年10卷13期。

40) 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6年。

41)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

42)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

43) 台北，中华书局，1981年。简体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

续高涨期。之所以如此，与八十年的文化热不无关系。受其影响，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的学者皆涉足书院文化，使其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系统化，取得了长足进步。

20世纪八九十年的书院研究，至少有四个特点。第一，成立专门研究机构或组织，开辟学术园地，形成比较稳定的专业研究队伍。1982年3月，随着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修复工作的进行，湖南大学成立岳麓书院研究室。1984年3月，该室扩大为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下设书院、理学等研究室。同年6月，该所邀请各地三十多位学者召开全国首次书院学术座谈会⁴⁴⁾。会后，江西教育学院书院史研究室也宣告成立。这是全国高校中成立最早也最著名的书院研究机构。1986年6月，湖南省书院研究会在岳麓书院成立。7年之后的1993年，江西省书院研究会成立于庐山白鹿洞书院。这是全国两个省级书院研究的学术团体。

最早的书院学术园地是《岳麓书院通讯》，创刊于1982年，1986年底停办，共出11期。《白鹿洞书院通讯》创于1989年，1993年改名《白鹿洞书院学报》，1998年停刊，共出14期。1988年、1989年湖南省书院研究会集结三次年会论文，出版两集《书院研究》⁴⁵⁾。1997年岳麓书院刊印中（陆、港、台）、美、日、韩学者组成编委会的国际学术丛刊《中国书院》，至今已出版七辑，每辑35~40万字不等。受其影响，白鹿洞书院和赣省书院研究会于2000年开始刊印《中国书院论坛》，已出版四辑，每辑30万字左右。除了以上专刊之外，一些综合刊物还开辟书院专栏，如《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自80年代设《岳麓书院与传统文化》，坚持至今，已经入选教育部全国高校学报首届13个社科“名栏工程”。其他经常不定期刊载书院研究文章的刊物就更多了，涉及教育、史学、哲学、政治、建筑、图书情报、文献、档案、文物等各学科，举不胜举。

举办学术活动，开展学术交流，是书院研究机构和组织推进学术事业的又一有力手段。常见的做法是定期召开年会，或开展重要的纪念性活动。如湘赣两省书院研究会就曾召开过十余次学术年会。1986年正值白鹿洞、岳麓两大书院创立1010周年大典，湘赣两省相关单位分别组织了盛大的学术讨论会，尤其是岳麓庆典有全国20个省市及美国、日本学者147人参加，收到论文139篇，除由湖南人民和湖南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文集外⁴⁶⁾，《岳麓书院通讯》、《湖南大学学报》亦各出一期专辑，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书院研究工作的开展。1994年东林书院召开东林党学术研讨会，纪念东林书院重建390周年，收到全国各地学者20篇论文。1995年，湖南书院研究会举办“湖湘文化与书院学术研讨会”。1996年岳麓书院1020周年庆典，邀请百余名学者举办“儒家教育理念与人类文明国际研讨会”，收到论文80余篇。1999年开始，岳麓书院和湖南电视台举办“千年学府学术讲座”，邀请杜维明、余秋雨、余光中、黄永玉、傅聪、张朝阳、许智宏、李学勤、金庸等名流登坛讲学，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同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以“中国文化的检讨与前瞻”为题，举办金禧纪念国际学术会议，有来自美国、加拿大、丹麦、韩国、

44) 朱汉民《书院研究座谈会纪要》，《岳麓书院通讯》，1984年2期。

45) 《中国书院研究》第一集，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中国书院》第二集，湖南省书院研究会，1989年。

46) 《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书院文化史研究文集》，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

澳大利亚及大陆港台的29位学者发表论文。⁴⁷⁾

上述这些机构与组织，成为书院研究的中坚力量，而通过其学术活动，将分散于各地各学科的研究人员逐步联系团结到一起，从而形成了一支比较广泛而稳定的专门研究队伍，有利于书院研究向纵深领域发展。

第二，深化原有议题，开拓新的领域。书院作为读书人经营的文化教育组织，和宋元以来的教育、文化、学术、思想、政治，乃至军事、经济等密切相关，是当时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年的研究注意到了这种联系，除了深化、拓展原有的教育、文化、学术、思想、宗教、图书馆、建筑等议题之外，还开辟自然科学、语言文字、军事、经济、出版等诸多新的领域。

原有课题的深化是多方面的。如宗教的议题，历来认为书院受佛道二教的影响，但却没有真正具体而充分的论证，只是泛泛而言。程舜英《佛教对中国教育和书院制度的影响》⁴⁸⁾、刘国梁《道教对宋明时期书院教育的影响》⁴⁹⁾、胡青《家族经济、道教与华林书院》⁵⁰⁾，为弥补这一缺憾作了有益的尝试。与此相关联，由天主教、基督教等外国传教士而涉及到教会书院，出现了邓洪波的《教会书院及其文化功效》⁵¹⁾，黄新宪的《教会书院演变的阶段性特征》⁵²⁾等讨论教会书院的文章，由宗教议题转化深入，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又如书院与政治、学术的关系，过去注意的目标是理学、心学、宋学、汉学、伪学案与东林党等，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学人的眼光已盯向社会大变革时代的清末书院，对其社会政治功用进行探究，涉及到新学、西学、洋务自强、托古改制、变法维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丁平一的《试论湖南书院对西学的融合与吸收》⁵³⁾、徐启丹《近代吴地书院的新学化趋向》⁵⁴⁾、徐静玉《近代江苏书院的新学化倾向》⁵⁵⁾、李志军《格致书院与实学教育》⁵⁶⁾、熊月之《格致书院与西学传播》⁵⁷⁾、刘世龙《清末上海格致书院与早期改良思潮》⁵⁸⁾、武占江、赵建强《味经书院与陕西的近代化》⁵⁹⁾等，都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论文。

有关书院与自然科学是一个新的议题。一般认为，古代书院以研习儒家经学为务，在自然科

47) 刘述先《中国文化的检讨与前瞻——新亚书院五十周年金禧纪念学术论文集》，香港，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年。

48) 《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49) 《书院文化史研究文集》，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

50) 《宜春师专学报》，1994年3期。

51)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3期。

52) 《湘潭大学学报》1996年3期。

53) 《求索》，1990年3期。

54) 《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4期。

55) 《南通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4期。

56) 《清史研究》，1999年3期。

57) 《史林》，1993年2期。

58) 《华东师大学报》，1983年4期。

59) 《中国书院》第三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

学教育方面几无足观。但许康、劳汉牛《书院的自然科学教育初探》⁶⁰⁾，白莉民《论书院与自然科学教育》⁶¹⁾，史贵全《略论上海格致书院的科技教育》⁶²⁾，张惠民《清末陕西的味经、崇实书院及其科技教育活动》⁶³⁾、《味经、崇实书院及其在传播西方科技中的历史作用》⁶⁴⁾却表明，宋代开始就有书院教授近代意义的自然科学教育，且历金、元、明、清九百余年代不乏院。到清末，正是这种教育使古老的书院经由“格致书院”而发展到新式学校。

书院与语言文字，也是这一时期才开始关注的问题。邓洪波《清代的推广官话运动考析》⁶⁵⁾、《正音书院与清代的官话运动》⁶⁶⁾，讨论清代书院推广“普通话”（官话）的贡献，潘建《书院与湖南最初的外语教育事业》⁶⁷⁾，则已推及外国语言文字。军事问题，由邓洪波《书院的军事教育与肄武书院》⁶⁸⁾首开讨论。以上皆属书院的专科教育，《中国书院制度研究》辟有专章纪述，可以参阅。

经济独立与讲学自由，在1925年曾作为“书院的精神”被提出来过。但对以学田为主的书院经济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空白，到1985年邓洪波《岳麓书院学田简述》⁶⁹⁾发表以后，才引起重视，已有近二十篇论文发表。高峰煜《历代书院若干经济问题述评》⁷⁰⁾、李才栋《清代书院经济来源变化及其意义》⁷¹⁾是两篇有影响的论文，《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一书辟有专章，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与此关联的商人、商业资本与书院的问题，近年也引起了注意。

史有“书院本”的记载，但书院刻书到八十年代才引起注意，刘实《漫谈书院的教育与刻书》⁷²⁾之后，刘佐之的研究值得重视⁷³⁾，《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也有专章论述，可资参考。一般认为书院刻书是其教学与学术活动的需要，所刻为教学的基础教材、书院学术特点的著作、学生学习成果、书院历史资料等图书，既能反映书院的研究成果，又能丰富教学内容，有着活跃学术气氛，提高治学水平，扩大书院影响的作用。

第三，开始与外界的学术交往。书院学术自由，讲究师生之间、不同地域与学派之间的切磋论辩，但自二十年代开始的书院研究却没有注意开展同域外学术界的联系，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

60)《湖南大学学报》1987年1期。

61)《湖南大学学报》1988年4期。

62)《教育史研究》1998年2期。

63)《汉中师院学报》1991年4期。

64)《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1期。

65)《教育评论》，1989年3期。

66)《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94年3期。

67)《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6年4期。

68)《船山学刊》，1992年1期。

69)《岳麓书院通讯》，1985年2期。

70)《中国书院》第一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71)《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2期。

72)《浙江师院学报》，1981年1期。

73)刘佐之有《论书院刻书的历史传统》，见《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书院藏书、刻书与书院教育》，见李国钧《中国书院史》附录一。

事。东邻的韩国、日本差不多与中国同时开始对中国书院的研究，几十年来发表了很多论文，出版了一些专著，尤其是当我们自五十年代起，中断工作近三十年的时候，他们则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以至有人发出了书院在中国，书院研究在国外的警声。国门开放之后，中外书院研究同仁有了交往。大久保英子《明清时代书院之研究》⁷⁴⁾、丁淳睦《中国书院制度》⁷⁵⁾等已为中国学人熟知。金相根先生《韩国书院制度之研究》已被很多学术论文引用，而金先生本人则在韩国著文介绍中国书院研究的成果⁷⁶⁾。韩、日学者的有关论文也间常见于报刊。邓洪波的《朱熹与朝鲜的书院》⁷⁷⁾，说明中国学人已注意到书院这一文化组织远输域外的现象。李弘祺在日本发表中国书院研究综述的文章，有利于学术信息的交流。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保定莲池书院等与日本同仁实现了互访交流。而随李弘祺 *Chu Hsi, Academies and thre Tradit on of Priuat, Chang-hsueh*”（《朱熹、书院与私人讲学的传统》）的翻译与发表⁷⁸⁾，我们对英语世界的中国书院研究也不再完全陌生。与此同时，1982年，对书院多有研究的张正藩从台湾返居江苏故里，在《岳麓书院通讯》发表几篇旧作，江苏人民出版社也再版了他的《中国书院制度考略》。从此，久久隔绝的台湾学者之声也开始传于大陆书院研究者之中。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书院研究已打破闭门造车之局，外界信息开始了有意义的输入。大陆与港台学者之间的切磋，中国与外国同行的交流，必将提升书院研究的整体水平。

第三阶段的研究以900余篇论文、40余部著作蔚为大观，标志性成果很多。分而言之，在基础的资料方面，有陈谷嘉、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史资料（全三册）》⁷⁹⁾。是书210余万字，取材于千余种地方志，近两百种书院志、课艺、日记、书目等书院文献，以及数百种正史、别史、类书、总集、文人别集等，并作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梳、标点整理，分书院的兴起、书院制度的确立、书院的推广与官学化、书院制度的再度辉煌、书院的普及、书院制度的近代化进程、书院制度的影响等七编，附有《四库全书》、《四部丛刊》集部著作书院文献篇目索引。由赵所生、薛正兴主编的《中国历代书院志》⁸⁰⁾，影印明清书院文献百余种，凡16巨册，为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原始资料。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文化丛书》⁸¹⁾，分楹联、学规、章程、揽胜、诗词五册，110余万字，是分主题整理书院文献的有益尝试。朱瑞熙、孙家骅主持标点整理的《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⁸²⁾，开启了院别书院资料整理的先机。陈连生主编《鹅湖书院志》⁸³⁾，则是新编书院志的第一

74) 日本，东京图书刊行会，1976年。

75) 韩国，文音社，1990年。

76) 金相根《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中国学研究》第14辑，1998年。

77) 1988年湖南省书院研究会第三届年会论文，公开发表于《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1期。

78) 邓洪波、潘建译，见《江西教育科研》1988年2期。

79)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80)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

81) 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2002年。

82) 中华书局，1995年。

83) 黄山书社，1994年。

部。孙家骅、李科友的《白鹿洞书院摩崖碑刻选集》⁸⁴⁾，使我们的视野首次转向纸质文献之外。如此大规模的文献整理，为书院研究的繁盛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综合性研究方面，有三部标志性著作。李国钧主编的《中国书院史》⁸⁵⁾，分五编二十二章三个附录，叙述书院从唐代至清代一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介绍书院藏书、刻书、考试情况以及历代书院名录，计有1190余页。本书以十四章约60%以上的篇幅讨论书院与宋元以来中国各主流思想学派的关系，独具匠心。对教育史研究而言，学派的引入使书院制度、教育流派可以上溯到渊源所自；对思想学术研究而言，书院的引入则使学术文化、思想流派可以下导于脉络所向，此所谓学派系于书院，正是学科交叉研究的魅力所在。季啸风主编、岳麓书院组织全国十余所高校学者完成的《中国书院辞典》⁸⁶⁾，140余万字，是中国第一部书院学工具书，集当年书院研究之大成，具有权威性。全书共收词3683条，其中书院1565条、人物1083条、文献598条、制度及其他437条。所附书院名录，收书院7300余所。陈谷嘉、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⁸⁷⁾，分类型、等级差异、职事类别、藏书及其管理制度、刻书事业、经费及其管理、书院的教育特点、考试制度、专科教育、走向世界的中国书院等十章。它是在完成《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国书院辞典》的基础上撰写的，厚积而发，从制度入手，运用大量史料，意在构建有着多种层次级差，涉及学术、文化事业，与官学、私学鼎足而三，具有积累、研究、创造、传播文化功能的中国书院制度体系，人称八十年代以来的精品之作，已被国内外学术界认同、采信。另外，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大量采用地方志，统计成果远胜于当年的曹松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引用。

专题性研究方面，亦有不少佳作值得介绍。杨慎初、朱汉民、邓洪波的《岳麓书院史略》⁸⁸⁾，是院别史研究的开山之作，随后出版的杨布生《岳麓书院山长考》⁸⁹⁾、杨金鑫《朱熹与岳麓书院》⁹⁰⁾、陈谷嘉《岳麓书院名人传》⁹¹⁾，使我们对这一世所罕见的千年学府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⁹²⁾，内容翔实，时有创获，是区域史研究的力作。1991年，朱汉民《岳麓书院与湖湘学派》⁹³⁾、吴万居《宋代书院与宋代学术之关系》⁹⁴⁾两书，分别在北京、台北出版，海峡两岸学者以不同的视角同时进入书院与学术问题的探讨。1992年，杨布生《中国书院与传统

84) 燕山出版社，1994年。

85)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初版，1998年2版。

86)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

87)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88) 岳麓书社，1986年。

89)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90)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91) 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

92)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

93) 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

94) 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

文化》⁹⁵⁾及丁刚、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⁹⁶⁾，同时将文化要素引入书院研究。王镇华《书院教育与建筑——台湾书院实例之研究》⁹⁷⁾、林文龙《台湾的书院与科举》⁹⁸⁾，则是台湾学者拓展研究领域的可贵尝试。凡此种种，皆值得重视。

5 新世纪的新动向：2000～2007年

跨世纪、新千年的热情也体现在书院研究上。2000年一年，就发表论文85篇，出版著作10本⁹⁹⁾，表现强劲。随后持续走高，在2002年突破百篇大关，2005年再破二百篇大关，至今仍然居高不下。新世纪仅8年时间就有论文1240篇，达到以往20年总和（916篇）的1.35倍以上，著作也有65部，呈现出一派繁盛景象¹⁰⁰⁾。纵观近几年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新的动向值得注意。

第一，新生力量。大量研究生进入书院研究的队伍，其朝气与热情，带来了勃勃生机。近年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很多学校规定硕士、博士论文答辩前必须发表论文，年青学者在寻找合适的切入点，进入研究领域。而书院以其为古代读书人的文化教育组织，涉及各种事业，具有多种功能，今日教育、历史、哲学、文学，甚至管理、经济、传媒、新闻各院系学生，从其已有的知识结构出发，皆可从中找到合适的研究题目。而且，近二十年大规模整理书院文献的努力¹⁰¹⁾，也为年青人快捷进入研究提供了不少便利。据统计，这个时期的论文有将近一半出自研究生之手，虽然硕士生的论文总体质量有待提高，但博士生的文章可圈可点者不少。近来出版的徐梓《元代书院研究》¹⁰²⁾、陈雯怡《由官学到书院——从制度与理念的互动看宋代教育的演变》¹⁰³⁾、刘少雪

95)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96)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97) 台北，故乡出版社，1986。

98) 台北，常民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99) 胡昭曦《四川书院史》，巴蜀书社；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中国书院规章》、《中国书院揽胜》、湖南大学出版社；樊克政《书院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日）沪友会编，杨华等翻译，《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商务印书馆；朱汉民、李弘祺、邓洪波《中国书院》第三辑，湖南教育出版社；闵正国、高峰《中国书院论坛》第一辑，中国文联出版社。

100) 论文增加，与当局以量化指标考核成风有关，不能排除虚假成分，但还不至于从根本上影响我们的判断。

101) 除了前述《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国历代书院志》、《中国书院文化丛书》、《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之外，还有《起凤书院答问》（台湾广文书局影印，1977）、《诗山书院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嵩阳书院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汉口紫阳书院志略》（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东林书院志》（中华书局，2004）、《明志书院沿革志》（台湾新竹市政府，2002）出版。邓洪波主持的《中国书院学规集成》、《中国书院章程集成》已完成200余万字初稿，正在联系出版；影印《中国书院志丛刊》的工作也在商议中，有望正式启动。

10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03) 台北，联经，2004年。

《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¹⁰⁴⁾、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¹⁰⁵⁾等四部专著，就是海峡两岸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生的勇气，加上其导师的严谨，相信会推动书院研究更好更快的向前发展。

第二，新的热点。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围绕热点问题进行研究的趋向。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教育事业的超常规发展，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除了取法西方、面向现代，回到传统、问计前贤，仍然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此，谈论书院与教育的文章很多，仅2004年一年，就有46篇文章，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其中胡群鸽《私学、书院、民办高校》¹⁰⁶⁾、杨炜长《书院的办学特色及对我国民办高校特色建设的启示》¹⁰⁷⁾、王鹏《书院教学特色及其对研究生培养的启示》¹⁰⁸⁾、《复修懿范、继美前贤——论我国古代书院教育的人文观念及现代启示》¹⁰⁹⁾、熊先进《我国古代书院办学理念的现代意义》¹¹⁰⁾、谢慧盈、汤善芳《吸取书院教学精髓、深化我国高校教改》¹¹¹⁾、杨果、赵治乐《也谈宋代书院与同时代的欧洲大学》¹¹²⁾、许志红《宋代书院与中世纪大学教学管理之比较》¹¹³⁾、慕景强《我国古代书院的教学法特色及现代启示》¹¹⁴⁾、吕晓英《书院传统及其对研究性学习的启示》¹¹⁵⁾、方彦寿《朱熹书院教学与远程函授教育》¹¹⁶⁾等，颇具代表性，涉及民办高校、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办学理念、教学法、学习法、教学管理、教育比较、远程教育等等问题，显示出人们希望从书院得到启导的强烈愿望。又如随着中国书院博物馆建设的推进，以及保护文化遗产的宣传，人们对书院文物的认识加深，如何保护书院文物也成为热点问题，2001～2003年，《中国文物报》、《文物天地》辟有专栏，发表江堤考察调查书院的系列文章近二十篇¹¹⁷⁾，《南方文物》也发表俞怡生、陈新民、刁山景、刘昌兵、王立斌的文章¹¹⁸⁾，介绍江西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书院。张曼西《元代浏阳文靖书院铜器浅识》¹¹⁹⁾、胡彬彬《书院文物定义界定初

104)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

105)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繁体本改名《书院教育与科举关系研究》，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

106) 《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1期。

107) 《船山学刊》，2004年2期。

108)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4年2期。

109) 《安徽大学学报》，2004年4期。

110) 《许昌学院学报》，2004年4期。

111)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4期。

112) 《湖北大学学报》2004年2期。

113) 《教书育人》，2004年8期。

114) 《当代教育论坛》，2004年10期。

115) 《惠州学院学报》，2004年2期。

116) 《中国书院》第六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

117) 江堤系列文章见《中国文物报》2001年8月5日、12月28日，2002年3月1日、3月22日、4月12日、5月24日、6月14日、7月20日、7月26日、8月9日、8月30日、9月20日，2003年1月1日、1月15日、2月5日、3月12日、4月9日；《文物天地》2002年1期、9期。

118) 分别刊于《南方文物》2001年2、3期，2002年1、2期。

119) 《中国书院》第六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

探》¹²⁰⁾，则对实物和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第三，新视野与新方法。长期以来，书院研究的主力由教育、历史、哲学三大学科的学者组成，其研究方法和视野已成定式。近年由于其他学科学者的加入，新的视野和方法引入书院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如蒋建国《消费文化视野下的清代广州祠堂与书院》，引入消费经济的理论，认为书院、祠堂祭祀是一种宗教和仪式消费，祭祀活动演化成节日聚会和节庆消费，人们在获取信仰和精神动力的同时，通过其消费品（祭品）、颁胙、仪式等，即消费的多少来显示其社会身份的等级秩序，其意义在于能够给富人带来潜在的利益和社会声望，鼓励的是一种金钱文化，而不是传统的伦理秩序¹²¹⁾。如此诠释祭祀，令人眼界大开。其他如肖永明引入社会学理论，讨论商人、地方官员、家族力量各自推动书院建设的动机与功效¹²²⁾；李兵引入统计学回归分析法，实证书院与科举的相关程度¹²³⁾等，都是一种开拓性的有益尝试。

第四，新成果。近几年，书院研究的新成果大量出现，由于时间尚短，有待考验，还不能以“标志性”来表示，但值得期待的仍然不少。杨慎初《中国建筑艺术全集10：书院建筑》¹²⁴⁾、《中国书院文化与建筑》¹²⁵⁾、《岳麓书院建筑与文化》¹²⁶⁾，持续探讨书院建筑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李才栋《中国书院研究》¹²⁷⁾，是其研究书院近四十年的论文选集。胡昭曦《四川书院史》¹²⁸⁾探讨书院与巴蜀学术、文化的发展，是另样的省域书院研究著作。以上是老一代学者从建筑、教育、历史学角度研究书院的力作，可敬可佩。朱汉民、邓洪波、高烽煜《长江流域的书院》¹²⁹⁾，以“长江文化”的视野来考察书院与学术、文化、家族、社会的关系，颇具特色。钱茂伟《姚江书院派研究》¹³⁰⁾，以整理清刊本《姚江书院志略》作资料篇，可见其研究篇必有益于人们对书院与浙东学派的认识。方彦寿《朱熹书院门人考》¹³¹⁾、《朱熹考亭书院源流考》¹³²⁾，以考据见长。前述以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的四部专著，代表着充满朝气的学术追求，其见解和学风颇多可圈可点之处。朱汉民、邓洪波、陈和的大型学术画册《中国书院》¹³³⁾，以历时六年田野调查的书院照

120)《湖南大学学报》，2005年3期。

121)《中国书院》第六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

122)肖永明《商人对书院发展的推动及其动机探析》（《大学教育科学》2005年1期）、《历代地方官员对书院的支持与促进》（《船山学刊》，2005年2期）、《家族力量对书院发展的推动及其动机》（《求索》2005年2期）。

123)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第十章。

124)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125)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126)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

127)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

128)巴蜀书社，2000年。

129)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13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131)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132)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133)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片来诠释书院，81所书院，380余幅图片和10万文字，首次让读者在视觉的艺术享受中感知书院文化的优雅与醇厚。邓洪波《中国书院史》¹³⁴⁾，展现书院的千年流变历程，既把握发展大势，又注意历代典型。此书在上海、台北推出简体、繁体两个版本，已经印刷四次，发行突破万册。在今天，学术著作有如此成绩，实属难能可贵，看来已经得到学术界认同。由此，或许也可预示书院研究的灿烂前景。

第五，东亚国际合作研究成为一种方向。书院是东亚儒家文化圈共有的一种文化教育组织，除了中国7000余所书院之外，李氏朝鲜书院超过1000所，而在日本，学校性质的书院有100余所，作为出版机构的书院也有不少，而且至今还在活动。经过多年推动，近来各国各自研究书院的格局开始改变，大家都在寻求合作。2006年11月，韩中日书院研究国际会议在韩国首尔国民大学校韩国学研究所召开；2007年10月，东亚书院与儒学国际会议在中国长沙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2008年1月，东亚书院传统的再思考国际会议在日本关西大学东亚文化交涉学中心开幕。洪波有幸，恭逢其事，在交流中，深感一个国际合作研究的新局面即将形成，在大的格局之下，书院研究必将走向深入、全面，迎来新的繁荣。

134) 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初版，2006年再版。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繁体本。